

文艺

文艺思想资料编年

第二辑

1926 — 1927

孙崇恩 周来祥 编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鲁 迅
文艺思想资料编年

第二辑

1926——1927

孙崇恩 周来祥 编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一九八〇·十二 内刊

目 录

古书与白话	(1)
不是信 (节录)	(3)
我还不能“带住” (节录)	(6)
《华盖集》后记	(7)
狗·猫·鼠 (节录)	(10)
致章廷谦 (节录)	(11)
无花的蔷薇 (节录)	(12)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节录)	(15)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后记	(15)
致韦素园 (节录)	(16)
《二十四孝图》	(17)
《痴华鬘》题记	(23)
再来一次	(24)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28)
《何典》题记 (节录)	(31)
《穷人》小引	(32)
致李秉中 (节录)	(36)
无常	(37)
马上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 (节录)	(44)
七月二日 (节录)	(46)

七月五日	(49)
七月六日 (节录)	(50)
马上日记之二	
七月七日 (节录)	(51)
致章廷谦 (节录)	(54)
致章廷谦 (节录)	(55)
记“发薪” (节录)	(56)
《十二个》后记	(57)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61)
《小说旧闻钞》序言	(66)
致韦素园 (节录)	(67)
记谈话 (节录)	(68)
两地书 (四一) (节录)	(72)
厦门通讯 (给 H. M) (节录)	(73)
汉文学史纲要	(75)
两地书 (五〇) (节录)	(121)
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 (节录)	(121)
《华盖集续编》小引	(122)
《华盖集续编·校讎记》	(123)
致韦素园 (节录)	(124)
致李霁野 (节录)	(125)
致陶元庆 (节录)	(126)
《坟》题记	(128)
两地书 (六六) (节录)	(130)
厦门通信 (二) (节录)	(131)
两地书 (六九) (节录)	(132)

两地书（七一）（节录）	（133）
致韦素园（节录）	（134）
写在《坟》后面	（135）
《嵇康集》考	（141）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150）
两地书（七五）（节录）	（152）
两地书（七九）（节录）	（153）
致韦素园（节录）	（154）
致韦素园（节录）	（154）
致陶元庆（节录）	（155）
致李霁野（节录）	（156）
致韦素园（节录）	（157）
两地书（八三）（节录）	（158）
致章廷谦（节录）	（159）
两地书（八五）（节录）	（160）
两地书（八六）（节录）	（161）
阿Q正传的成因	（162）
致韦素园（节录）	（169）
致韦素园（节录）	（171）
两地书（九三）（节录）	（172）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173）
新的世故	（178）
致韦素园（节录）	（186）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	（188）
两地书（一一二）（节录）	（193）
《绛洞花主》小引	（194）

致韦素园（节录）	（195）
无声的中国	（196）
老调子已经唱完（节录）	（201）
致李霁野（节录）	（208）
致韦丛芜（节录）	（209）
略论中国人的脸（节录）	（210）
革命时代的文学	（211）
致李霁野（节录）	（218）
致台静农（节录）	（220）
致李霁野（节录）	（221）
《野草》题辞	（223）
《朝花夕拾》小引	（224）
致孙伏园（节录）	（226）
致章廷谦（节录）	（227）
《小约翰》引言	（228）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后附记	（236）
致章廷谦（节录）	（237）
致章廷谦（节录）	（237）
致章廷谦（节录）	（238）
《游仙窟》序言	（240）
《朝花夕拾》后记	（241）
读书杂谈（节录）	（251）
致章廷谦（节录）	（255）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57）
致章廷谦（节录）	（273）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274）

书苑折枝	(285)
致章廷谦 (节录)	(287)
致章廷谦 (节录)	(288)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289)
答有恒先生 (节录)	(322)
革“首领”	(325)
《唐宋传奇集》序例	(329)
谈“激烈”	(332)
扣丝杂感	(336)
书苑折枝 (二)	(343)
致翟永坤 (节录)	(345)
致章廷谦 (节录)	(346)
怎么写 (夜记之一)	(347)
小杂感 (节录)	(354)
致台静农 (节录)	(355)
致李霁野 (节录)	(356)
书苑折枝 (三)	(357)
革命文学	(359)
关于知识阶级	(361)
致李霁野 (节录)	(368)
《在沙漠上》译者附识	(369)
致江绍原 (节录)	(371)
致翟永坤 (节录)	(371)
致江绍原 (节录)	(372)
《信州杂记》译后附记	(373)
致李 小峰 (节录)	(376)

《尘影》题辞	(377)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378)
在钟楼上 (夜记之二) (节录)	(380)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383)
文学和出汗	(390)
文艺和革命	(392)

古书与白话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诬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嘲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

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已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若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初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国民新报副刊》。

《鲁迅全集》三卷《华盖集续编》

不 是 信

(节录)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庸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

大本的“标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标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

说(1)已有人译成(2)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标窃”，还是做“蓝本”，不久(2)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

初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署名鲁迅。

《鲁迅全集》三卷《华盖集续编》

我还能“带住”

(节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鲍昌、邱文治编《鲁迅年谱》注明本文“初发表于三月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其他版本皆为“本文初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

《鲁迅全集》三卷《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 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象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象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

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至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

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初收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版《华盖集》。
《鲁迅全集》三卷《华盖集》